创业历程

接管重庆市伪第八警察局前后

王家珍

1949年4月，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一举解放了南京、上海。中央又号召在一年内解放江南九省（包括云、贵、川、康）。当时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同志在南京伪国大礼堂作报告说："二野奉命解放大西南，任务伟大光荣又很艰巨，是八千里路小长征。"我当时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回到安徽芜湖二野三兵团军政干校驻地。

9月初，进军令下达了。我带着军大三分校学生（当时我任三大队政委）行军到南京下关，乘闷罐车经徐州、郑州……到了湖北孝感。接着徒步行军到达湖南常德。在这里听取了重庆地下党派来的邓照明、肖泽宽同志介绍的重庆敌情、社情以及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的分布、管辖区的划分等详细情况。

为了顺利完成行军任务，以便进入重庆后直接投入接管工作，根据二野前委刘、邓首长的指示，当即组建了接管班子。二野三兵团组织部长刘明辉任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长，率领一支公安工作队（一部分为部队转来的团、营、连、排南下干部，一部分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南下学员和二野军大三分校112名学员），统一编入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分队，一个中队接管一个警察局。中队领导干部属团以上的，被任命为公安分局局长（即这个辖区的军事代表）；分队长属营以上干部，为分局科级干部；连级干部为各派出所所长。我被任命为第八公安分局局长，负责接管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民党第八警察局，为这个辖区的军事代表，做到了每个干部定岗、定位。

入川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重庆解放指日可待，支队部决定，接管各警察局的领导于11月6日乘汽车先行出发，其余干部也于11月8日从常德徒步出发。我是同苏优天（一分局局长）、程迪回（五分局局长）、梁子平（六分局局长）、郭兆吉、石明清等同志同车。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刘明辉局长已随前线指挥部入城。我们随后于12月4日晚到达原九龙坡区土桥王家坝，在现3403厂（原为汽车修理厂）住了一夜，第二天从海棠溪过江，直奔公安局报到（地址现军分区），当即发给了特别通行证（证上书明第八分局局长，现仍保存）。当天午餐未进，即赶往化龙桥接管伪第八警察局，我只随身带着背包和手枪。

伪八警察局局长刘桐早已逃跑，只有一个户籍主任名谢炳全在局门口迎接我，他是看到接管条例后自己留下来的。他把全局存下来的档案、户口卡片、财产、办公用具等交给了我并介绍了辖区内的大致情况。该局辖化龙桥、李子坝、浮图关、黄沙溪、遗爱祠几个派出所。我就地住下。当时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作恶。匪特未除，社会治安很乱。记得一天夜里匪特在我住处甩了一枚马尾弹，幸未爆炸。我保持了高度警惕，谢炳全暗地里派自卫队给我站岗。

国民党警察局人员吃饭，一直沿系着向群众的菜摊、肉店搞摊派的惯例（名曰打菜），开始他们对我亦如此，被我发现制止了。刘桐的黄包车夫在我下所下段了解情况时，要给我拉车，我拒绝了，叫他把车交了，另给他安排了工作。

接管中，由于人手少，情况不明，接近我的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后来镇反中发现的）。曾在红岩村掩护我八路军办事处的饶国模老人（儿子在延安），于我到达的第二天就来与我接头，反映了很多情况，并了解到第八警察局为什么设在偏僻的化龙桥。原来，这个局直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领导，专门监视我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

从阴阳树到大街不到一千米的范围内，小道旁的小食部、小卖部、地摊、擦皮鞋的、流动菜篮、夜间卖炒米糖开水的，以及附近种菜的，差不多都是化了装的便衣特务和警察。化龙桥地区有一个叫黄××的，以积极分子身份经常接近我，后来镇反中了解到此人为当地欺压群众的大恶棍。捕后，群众大快。

这个区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在我军入城后被关押起来。区长逃跑了，副区长住化龙桥，在我来到不久，即向我自首，表示立功补过，鉴于他没有多大罪恶，受到宽大处理。

从12月9日起，公安干部陆续前来报到，12月10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对外宣布正式成立，部长为刘明辉。

第八分局不久搬到化龙桥虎头岩石房子办公，对外挂牌。下设四个科：一科为人秘科，科长李德顺；二科为政保科，科长王建中；三科为治安、户藉、警罚科，科长史玉平；四科为总务科，由赵启元任管理员。分局下属五个派出所，化龙桥所长刘景珍、李子坝所长张兆俊、浮图关所长赵培艳、黄沙溪所长陈继成、遗爱祠所长李刚。

这段时期，我们按先接后管，边接边管方针，先后接管了辖区内蒋帮党、团、军、警、宪、特大大小小单位，收缴了大批武器、弹药、电台、档案资料、财产等。

12月13日，我作为军事代表去接管了第八区公所。

12月11日、12日、16日军管会连续公布了《蒋军溃散军官登记办法》、《反动党团登记办法》、《收缴非法武器、电台办法》，我们就地紧张地开展了对蒋军溃散官兵登记工作，接待前来自首的国民党党、团、军、警、宪、特人员和群众交来的一切非法物品，以及收缴非法武器、电台等。

鉴于社会治安情况，军管会于12月20日起发布了戒严令，每日23时至次日6时止为警备时间，我局所有干部身配军管委符号，夜夜巡逻值勤，直到1950年7月30日才解除戒严令。

1950年1月9日，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下属22个分局亦正式

成立。1月18日市委发出发动群众进行反特斗争为中心的指示，市政府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彻底肃清匪特破坏活动，建立革命新秩序，逐步恢复发展生产，巩固胜利果实的号召。我分局全体干警认真执行市委市府指示，深入发动群众，调查摸底，收集敌特材料、侦察敌情动态、接受群众检举，为集中对国民党匪特及其他危害治安的罪犯进行打击作准备。“3.13”大逮捕震撼了匪特、恶霸，群众拍手称快，敲锣打鼓来分局送感谢信，群众靠拢我们，生产逐步恢复，社会治安大大好转。

4月24日市委发出《关于建立区级党委组织及政权机构的决定》，按居民特点、地理交通条件和工作需要，将原全市19个区合并为8个区，我第八区与十七区合并为第四区（含李家沱、大渡口）公安分局相应与十七分局合并。

成立第四区时，岳林同志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来任区委书记，冀文广同志为区长，市委指定岳林、冀文广、赵诚、王家珍、李儒君、江××等组成区委会。

1951年第四分局迁往大坪。

至此，接管工作结束，清匪、反霸、肃特、治安、交通、消防、户籍……以及政权、党务工作转入正常。

接管原重庆市第十七区

翟知非

(1)原十七区概况

原重庆市第十七区是国民党政权时的建制，区公所在石桥铺，位于重庆西郊，是当时附近几个乡镇群众集市贸易的中心所在地。每逢场期，各地人、物聚集交易，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平日清静冷淡，过往行人甚少，只有几户铺店开门，是个地地道道的乡镇集市。

该辖区内的经济状况是以农业为主，约有少量商业、服务业。农民中以佃农为主，而且大多为贫农、下中农。少数地主居于乡村，大部分地主聚居城内，均兼工商业及其他业。

原第十七区所辖地域，东接大坪，南临长江，西与人和毗连，北靠凤鸣山，略似环形地带。按行政区划共计有16保，内含6条街，即石桥铺、歇台子、杨家坪、鹤皋岩(即黄家码头)、滩子口、黄桷坪。辖区内有两条公路：一条为两九公路，由两路口途经大坪、袁家岗、杨家坪到九龙坡长江边；另有一条公路，由两路口经过大坪、歇台子、石桥铺去凤鸣山。辖区内黄桷坪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即现在四川美院)，谢家湾有国民党兵工厂21分厂(即现在建设厂)，歇台子设有国民党电讯局重庆收报台，九龙坡有座国民党军库，九龙坡河边建有九龙坡飞机场(即现在九龙坡火车站)，在九龙坡河边(即现在铁路与公路交岔处坎下)有座平房，是蒋介石过往候机、乘船休息处。

(2)接管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

重庆解放后不久，西南服务团在湖南常德整编时确定了接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庆各单位负责人员，随后赶抵重庆。派往第十七区进行接管的军代表赵诚（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奉市军管会令与地下党员张培元（任副区长，在原十七区以保干事为职业掩护，进行地下工作）、警卫员孔××（进军西南的同志）等3人到石桥铺，接管了第十七区区公所，正式宣告旧政权的结束和新政权的建立。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学生大队3中队队长韩志胜，从湖南常德乘汽车赶抵重庆，随即到达十七区参与接管工作。他们首先接管敌伪档案以及残留的枪枝弹药，并对敌伪政权人员进行处置工作，举办了学习班。经审查后留用了张蕴涛、袁辉美、王先云3人。其余人员按政策一一落实，作了妥善处理。

自此以后大批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相继抵达，于1949年12月28日来区的有：山东老干部鞠自乐、3中队学生干部蒋贻端、石家时、冯维藏、孙森洲、姚建中、支正华、钱韵（女）、袁佩玲（女）、裘佩珍（女）、羽东（女）等11人。于29日到达的有：西南服务团学生大队1中队学生干部李亚宾、翟知非、乐晶婴（女）、魏昭（由川干队转入西南服务团），2中队有徐仲篪、老干部庞玉公等6人。于1950年1月来区的有老干部耿连生、陈叔文、李成德（女）。当时参与接管工作的共计25人。其中有8位老干部、1位地下党员、15名学生。其中另外有一名担任炊事员的翁××是广东人，重庆市第四区迁驻李家沱后自愿返乡了。

接管后，为了增强区公所武装通讯力量，在辖区内挑选10名青壮年参加工作，组织警通班，由区长警卫员孔××管理训练，执行警卫通讯工作。他们是：朱长利、朱长寿、黄兴友、马伯钧、孙志林、钱世钧、钱国富、李金明、吴玉林、郭××等。此外，还在1950年初，吸收了青年学生张文祥参加工作。正式工作人员总计38人。

1950年上半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区委与区公所分别配了机关工作人员。区委设有内勤，由蒋贻端担任，行政徐仲篪。区公所设有内勤，由石家时担任，缮写由张文祥负责。民政调解由支

正华担任，文教由李亚宾充任。财粮由翟知非、乐晶婴、羽东等3人办理。张蕴涛、袁辉美搞机关财务和行政事务工作。余下人员都下农村，到群众中去，调查了解情况，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的工作。把挖穷根，开诉苦会，吐苦水，作为进行自我教育的活教材。

(3)取消保甲制　建立农协会

1950年6月，重庆市第十七区公所在黄桷坪女子师范学院内召开了第一次农代会，选举产生了区农协筹委会主任赵诚。同时各村推选农民代表，接管伪保甲长的一切工作。此时，各村相继成立村农会。1950年下半年改保为村，将16个保改名为：胜利村、二郎村、黄泥村、高庙村、六店村、圣泉村、歇台村、桂花村、新民村、五台村、杨坪村、解放村、民主村、九龙村、上游村、石桥铺街。自此，取消了保甲制，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翁的基层农会组织。为日后的乡、村政权建设打下了基础。

(4)建立工作点　征收爱国粮

为了面向基层全面开展工作，区决定全体工作人员各分管一个行政村，按地形组建3个点。石桥点：由赵诚为领导，杨家坪点：由韩志胜、陈叔文为领导，歇台子点：以耿连生、鞠自乐为领导，带领大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征粮工作。1950年9月，区召开农代会，部署征粮和评查产量工作。由于刚解放，城市和前线部队急需粮食，征粮工作是当时主要任务。各基层政权人员全力以赴。许多青年同志都是从学校门直接进入革命队伍，没有群众工作经验，群众对人民政府不了解，敌人又造谣破坏，地主持观望态度，情况复杂，斗争尖锐。对从上海参军的大中学生来说，走田坎，转茅屋，访贫问苦，与穷苦农民交往，都是开天劈地头一遭。初到农村时，女同志怕狗咬，男同志不会走田坎路。吃的是“92米”、“81面”，穿的是粗布衣，每月津贴旧币5.00元(合新币5角)菜金3.00元(合新币3角)，为了工作方便每天吃两餐，但毫无怨言，工作积极

热情，精神饱满，干劲十足。节假日还排练小型节目向群众宣传演出。1950年10月，秋粮征收工作历时18天胜利超额完成。

(5)撤消十七区并入新四区

1950年10月，八区与十七区正式合并，宣告成立重庆市第四区。为了充实力量，市府派了老干部吴道安、莫鸿干到新四区工作。原十七区的同志均已分配到党、政、群各部门。赵诚任区委组织部长，韩志胜任组织部干部干事，耿连生任组织干事，钱韵、蒋贻端、陈叔文在组织部，莫鸿干任区委秘书，庞玉公、孙淼洲、冯维藏在区农协会，李成德任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裘佩珍、袁佩玲分配在妇联，分在区府的吴道安任财粮科副科长，鞠自乐任民政科科员，乐晶婴、石家时、魏昭、翟知非、羽东、支正华、李亚宾、姚建中、张文祥、王先云、张蕴涛、袁辉美等分在区府各科室工作，警通班10名同志，各分在区委、区府、妇联、农协。各部门不断完善，新来区的同志有增无减，区里一切工作有头有绪的继续向前迈进。

巴县二区剿匪记

朱学章

解放前夕，我常来白市驿街上，目睹当时的反动统治，欺压百姓，凌辱乡里，群魔横暴，民不聊生，特别是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使人难以维生。临近解放，反动派更加猖狂，机场爆炸，黄荆桥毁损，为我们耳闻目睹。我们众多的人都在议论：何时摆脱苦海，盼望解放军早日到来。“解放”终成事实，在党中央英明领导下，解放军冲破艰难险阻，解放了白市驿区。1950 年 1 月，我经亲戚涂巨斌介绍，加入了征粮工作队。征粮工作进行不久，土匪开始猖狂。于是冯副区长就调我到剿匪工作队工作。他任工作队副司令员，我作侦察员，经常与他一道，一直坚持剿匪。剿匪中我作了带路、侦察、清剿等工作，有时成了保卫首长的警卫员。在走马乡的剿匪战斗中，组织安排细致，指挥有力，作战有方，不少同志英勇顽强，在所谓的“敌众我少”的情况下，常常是以少胜多，使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在那里我们抓获了刘天祥、何云光等惯匪 6 人。经查明罪恶后，决定将刘天祥 1 人，在走马乡处决，其余 5 人在白市铁厂五星桥枪决，我本人均亲自参加。

经过这次战斗后，土匪企图反扑，拾着“大队长何云光”的尸首，在走马乡游街，扬言要来抢白市驿，以此威胁群众，煽动人心。次日我们同住白市驿的解放军官营长一道研究，讨论对策，决定叫我先去走马调查情况，调查后返回白市驿。经研究后，第二天就派兵进攻“双河乡”（即现在的江津双河乡）。我们分三路前进，途中打了两个遭遇战，敌匪慌乱退逃。在战斗中，我们有极少的同志光荣负伤。伪乡长张思桥来与我们假联系，谎说某某是好人，均被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场识破，匪徒李平贵、肖时候等均被当场认出，后来就把他们监视起来。我们在冯区长指挥下，众匪徒伤亡而逃，肖匪被打死，附和之众更是奔命远遁。我们部队全部在双河乡汇集，得胜之师，兴奋至极。我们押着一百多个俘虏，其中就有匪首文巨伯等三人，大队胜利回师，直返白市驿镇。回来后的次日，就将查清了的匪首文巨伯枪毙。

这次剿匪战斗，虽取得了胜利，但清匪工作并未结束。商议后，先派我去福寿乡调查，了解陈华国等群匪情况。在途中石桥荡处遇上一伙匪徒，一阵乱枪，几乎使我丧命。打了约20分钟，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到来，将土匪打跑，才将我救下。这天正是土匪来抢石板乡，整个街上遭到洗劫，乡长也险些遇害。当天，群众戴开基被土匪杀害。不一会，白市驿部队到来，才将土匪赶跑，匪首刘成海、郭向兵等均被追逃。经过此次清剿，土匪又有一定的伤亡和逃窜，但仍盘踞在陶家、福寿、石板等三个乡。返回白市驿研究后，又决定集中力量，整理好大队人员，计有解放军一个营，机场警卫连一个连和区中队共约700人前去围剿。这次清剿三个乡，重点是园明乡，我们一队攻击园明乡踞匪。官营长又派我先去侦察。了解情况后，我回来汇报匪情：土匪集中在园明乡，人比过去多，园明乡被土匪占据，老百姓几乎跑光。预计这次战斗，比前几次激烈。于是，官营长迅急派我们四人，前去作尖兵，即连长一人，排长两人和我，大队随后。这次清剿队伍约700人，是晚上出发，分三路前进，进攻这三个乡。次日拂晓前后，我军三路同志，先后与敌人接触，都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比较起来，我们进攻园明乡一路，因土匪人多，战斗比较激烈。我们四人前进，先看准三个哨兵，首先用尖刀将其刺死，匪首刘成海在乡里的楼上开枪，打伤了我们一个排长（事后土匪招认）。我们队伍紧跟前进，围住园明乡，枪声不断，敌人惊慌，四处逃窜。我们区中队力量稍小，但我使用的那挺轻机枪，连连扫射，打死不少敌人。整个园明乡的战斗，打死匪徒一百多人，抓获部分，多数溃

逃。我们在园明乡枪毙了匪首九人，其中有匪队的总参谋长刘成海和喜哥等。接着带上俘虏，胜利地返回白市驿区。

在园明乡剿匪取得胜利那天，是1950年旧历2月16日。激烈战斗，是从二月初八开始，短短10天时间，取得如此胜利，确实不易。这段时间，给人的考验不少，指挥人员机智神勇，战士们英勇无敌，区中队的同志，也是奋力当先，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从整个剿匪中，看出土匪数量，约计在一千以上，有的是同志们调查到，有的是俘虏坦白，据称：土匪中有“反共保民军”一个团（谓九路军），还有一个总队，队长陈少伯，下有四个大队，大队长为何云岗、文巨伯、任大云、伍复昌等。在园明乡经我们剿匪战斗后，就全部被打垮、打散。逃跑的匪首在一、二年后均被抓获，如陈少伯、李平贵、伍复昌，还有特务伍时隆等，都押回白市驿处决了。

就此，土匪清除，再也没有出现干扰，“3.13”大逮捕后，形势更加好转，社会秩序更加安定。

第四区的土改运动

张得众

原重庆市第四区(即九龙坡区前身)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1年1月20日开始,历时3个月,于1951年4月20日基本结束。土改运动之所以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胜利完成,主要是党的土改政策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心愿和其根本利益;在1950年冬季开展了减租、减押、反霸斗争,为进行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组建了农民协会,为进行土地改革培养了大批骨干,这些都为开展土改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现将原四区的土改情况概述如下。

训练干部　明确任务

参加这次土改的干部共有301人。其中原在农村搞减租、退押、反霸工作的机关干部30人,军队干部12人,西南革大学员10人,市文联干部6人,中学生86人,农民骨干157人。这批干部除极少数是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外,绝大部分是参加工作不久或刚参加工作的新干部和不脱离生产的农民骨干。因此,对这批干部加以训练是十分必要的。区委、区府于1月20日到2月2日开办了农训班,对这些干部进行了系统的训练(军队、革大、文联28名干部未参加)。通过学习,一、懂得了土改运动是彻底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解放农村生产力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从而决心在这场运动中锻炼自己,为土改为农民翻身解放贡献力量;二、明确了土改运动必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和没收、征收地、富财产的基本政策,在工作中必须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三、总结了减租、退押、反霸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土改工作提供了实际的工作经验。这批干部经过训练,热情高,干劲大,结业后分配到全区

4个乡16个村(石桥乡:胜利村、二郎村、黄泥村、高庙村、圣泉村;歇台乡:六店村、新民村、箭道村、桂花村;杨九乡:九龙村、黄桷村、五台村、杨坪村;大坪乡:大坪村、化李村、解放村)与广大农民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宣传政策　揭露谣言

这批干部下到各村后,与广大乡、村干部一起,分别召开了雇农、贫农、农会、妇女、青年和地主会,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土改政策,每天晚上的农民夜训班也学习土改政策,使得土改政策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揭发了不法地主制造的"60岁以上的,6岁以下的人不分地","不加入农会的人不分地","要把富农送到东北去","先动地主后动富农","贫农分边田"等谣言。通过对这些谣言的揭露,广大群众认识到,这些谣言的中心,是歪曲土改政策,妄图制造混乱;混淆党对中农与富农、富农与地主的政策界限,以达到增加土改阻力,破坏土改的目的。经过广泛深入地宣传政策,揭露了谣言,澄清了是非,稳定了人心,从而得到各方面良好反映和拥护。贫雇农积极要求土改,以便更有力地打击地主,及时分田分土。自耕富农知道了土改政策规定不动他的田,心里很高兴,拥护土改。佃富农迫切要求土改,以便把"富"字去掉,好分田分土。中农觉得自己不分进也不分出,放下了怕划成富农的思想包袱,并拥护土改。地主是这场革命的对象,眼看大势所趋,表面上也不得不拥护土改。

整理农会　纯洁组织

在减租、退押、反霸斗争中,全区共发展了农会会员5,335名。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情况不熟,经验不足及地主分子的破坏等原因,不可避免的混进了少数坏人。数量虽少,但能量很大,这对胜利完成土改任务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必须加以整顿(当时称整理)。为此,采取了充分发动群众,上下结合检查的办法,对农会组织进行了清理。发现有少数农会干部被地主收买,介绍地主、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加入农会;有个别村干部压制民主,贪污押金;有的

袍哥大爷，三青团员当上农会小组长。通过整顿，清洗了307名坏分子出会，撤销了45名农会小组长和24名村农会委员的职务。同时发展了917名积极分子为会员，选拔了48名会员为村农会委员，109名会员为小组长。经过整顿，全区正式成立了四个乡农会和16个村农会，共拥有会员将近6,000人，纯洁了农会组织，增强了农会的战斗力。

划分阶级　评查成分

在减租、退押、反霸斗争中，对于阶级成分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划定，为了更准确的体现政策，不错划一个人和制止要求成分逐级下降（有少数地主认为自己是富农，富农认为自己是中农，中农认为自己是贫农）的趋势，采取了以划分阶级的政策为依据，各村各找一户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为标准，各户自报，小组评议，大会通过，两榜定案，政府批准的办法进行了评查。这样，不仅成分划分得准确，阶级阵线清楚，而且对不老实的地主分子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评查后全区各阶层的人口状况是：地主1,629人，工商业兼地主（含地主兼工商业）623人，富农667人，佃富农1,755人，中农671人，佃中农3,767人，贫农532人，佃贫农4,902人，雇农1027人，手工业者28人，小贩130人，贫民337人，其他2,024人。

斗争地主　分配财产

地主阶级不仅在历史上有罪恶，在土改过程中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搞破坏，制造谣言，破坏家具，淹死耕牛，腐蚀干部，私藏枪支，组织“反共团”等。广大群众非常愤恨，要求政府严办。为了把地主的反动气焰打下去，保证土改顺利进行，全区共斗争了地主149名，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第四区人民法庭判决枪毙了恶霸地主10名，特务地主7名，二地主一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的封建地主阶级终于被搬掉了，人们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欢呼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伟大胜利。

地主阶级被打倒以后，政府没收了他们的田土和财产归还农民。全区没收、征收田78,985石(本地当时的习惯，计算田、土数量，不按亩分计算，而以产量“石”为计算单位)，土12,272石。对于这些田土在原户的基础上，本着“田土好坏，距离远近，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田土搭配”的原则，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土地最多的石桥乡平均每人分田土6石，大坪乡平均每人分田土3.8石，土地最少的化李镇平均每人也分到了田土将近一石。对于没收地主的农具、牧畜、粮食、房屋、家具，按照“多缺多分，少缺少分，不缺不分”和“雇农为一等，贫农为二等，中农为三等”的原则，分配给了农民。

庆祝胜利　不忘警惕

1951年4月20日，四区庆祝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的大会召开了。翻身得解放的农民人人喜笑颜开，高举红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浩浩荡荡地走进会场。当大会宣布全区土地改革任务已经胜利完成时，全场响起了久经不息的掌声和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广大农民从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政府给予的当家做主的权利。非凡的大会，标志着地主阶级已经被彻底打倒，标志着广大农民已经成了国家的主人，同时也标志着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标志着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大发展，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胜利的年月，人们并没有忘记警惕。694名武装起来的农民自卫队员日夜保卫着这大好的形势。地主阶级总是不甘心死亡的，日夜梦想翻天复辟。五台村地主组织了反革命组织“反共团”，妄图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可是他们的一举一动均被自卫队掌握，破获了他们的组织，收缴了他们的枪枝，不仅保卫了土地改革的成果，而且也保卫着这大好的形势继续向前发展。

附：参加土改工作人员八项纪律

一切参加土地改革干部与工作人员，在土地改革期间，必须严

格遵守下列纪律，以保证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确实施：

一、严格执行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令，不得违反；

二、坚持拥护土地改革，不得包庇地主；

三、廉洁奉公，不得贪污果实，不得接受贿赂；

四、尊重人民民主权利，倾听群众意见和批评，不得欺压人民；

五、一切重要问题和大家商量，不要个人决定，包办代替，强行推行；

六、依照法律手续办事，不得乱捕、乱罚、乱打、乱杀，不得使用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七、坚决服从上级指示，不得阳奉阴违；

八、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不得虚报情报，不得各自为政。

对上述各项纪律有违反者分别情节轻重，予以应得处分。

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崔保华

1951年初，重庆市第四区筹备召开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政府根据区委指示，于1月23日草拟了一个宣传提纲和15条宣传口号。经反复斟酌、修改，于1月29日交“重庆市第四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第一次会议25名委员讨论通过，30日上报市人民政府，31日获市府批准。

这份宣传提纲文字简炼，语言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时代特征。群众普遍反映：“共产党、人民政府说话实实在在，不像国民党那样官调。”48年过去了，重读这份宣传提纲，“窥斑见豹”，我们看到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史为镜”，我们从“自己的政府自己管，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这样质朴的话语里领略到了“人民至尊”。为知新而温故，现将《重庆市第四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提纲》实录于后，以飨读者。

《重庆市第四区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提纲》

一、为什么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我们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开过四次，都开得很好。每次会议各界人民代表都能把人民的意见带到会议上去，经过讨论，成为决议，人民政府即去执行。市人民政府准备要作的工作，亦经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后去执行的。这样，就做到了人民监督政府，政府联系群众，集中意志提高了行政工作效能，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了更广泛的吸收人民意见，加强区政与人民联系，只有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因为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多是一些全市较大的、比较原则性的问题。区有区的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